

南方民族研究论丛

第四辑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学系编



南方民族研究论丛

第四辑

本辑主编：孙秋云

助理编辑：刘志军 崔 榕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凤荣

装帧设计:张雄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民族研究论丛 第4辑/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9

ISBN 7-105-03617-6

I. 南… II. 中…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97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中南民族学院印刷厂微机照排 中南民族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武汉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500 册 定价:12.2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 言

今年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吴泽霖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他老人家曾为我院民族学科的建设、民族学教学科研机构设立和民族学教学科研人才的培养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作出过较大的贡献。本辑中特选发三篇文章以表达对这位著名前辈学者的纪念和缅怀之情。

本辑作者队伍中新增了一些新鲜血液。他们都是在民族研究领域兢兢业业、勤奋求索的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尽管有些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观点尚不够成熟，行文也有略显幼稚之处，但谁能说参天大树不是从细枝嫩芽开始成长起来的呢！本“论丛”愿为他们的茁壮成长垫石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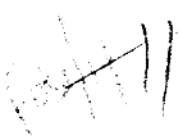
本“论丛”的编辑出版是我院，尤其是我系、所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集体科研成果。但为了充分尊重编辑人员所付出的劳动，从本辑开始试行系、所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的主编负责制，以明确编辑人员所具有的权利和责任。

校外专家开始主动关注本“论丛”的出版，纷纷赐稿或提出宝贵意见，这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愿尽最大努力将我院这份深具特色的“论丛”办好，以不辜负同仁的厚望。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辑论文中一定还存在着缺点和不足，我们衷心希望得到国内外同仁的批评指正，并进行学术交流。

编 者

1998年10月



目 录

日本社会学一瞥	吴泽霖(1)
吴泽霖“文革”时期在故乡常熟琐记	祝仲煜(5)
关系和关系研究	
——介绍《中国城市的工作和不平等》并	
以此纪念吴泽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钟 年(12)
黎族史新证拾零	吴永章(16)
论少数民族的灵魂观念与祖先观念	柏贵喜(20)
田野工作与民族学研究	孙秋云(42)
巴东土家族跳“撒尔嗬”实录	董 璐(65)
论明清鼎革之际湖广容美土司的政治立场	田 敏(75)
白虎崇拜与土家族民族性格浅析	崔 榕(91)
两湖地区早期汉化进程述论	韦东超(99)
加拿大的语言冲突和多元文化主义进程	刘宝俊(114)
外联内聚 顺时励精	
——世纪末台湾中国回教协会活动评析	
.....	许宪隆(125)
近代回族文化运动本质论	哈正利(133)
从《热什哈尔》看马明心的宗教革新活动	杨忠东(145)
试析李贽的伊斯兰情结	杨广恩(154)
西南周边国家与我国发展边贸措施的比较分析	
.....	沈道权(163)
湘南过山瑶妇女婚姻观念的变迁	吴秀芳(175)
明代广东汉瑶两族的融合小议	杨小华(189)

关羽神化的轨迹及其文化背景分析·····	刘志军(194)
关于我国民族团结的法律思考·····	才慧莲(203)
试论裴李岗文化的埋葬制度和社会性质·····	黄迎新(211)
滇系铜鼓中几种常见纹饰的分析·····	王瑞莲(222)
清代湘鄂西边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考察·····	段超(232)
多元一体 共建共立	
——云南民族文化形貌浅议·····	邹逢佳(239)
汪忍波与傈僳族音节文字述论·····	木志芳(249)

日本社会学一瞥

吴泽霖

20 世纪初期，日本即已从欧洲引进了社会学，其内容主要是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为依据的，在当时，它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而受到欢迎。嗣后，在不断吸收了孔德 (Comte)、齐美尔 (Simmel)、菲尔坎特 (Virkhant)、维塞 (Wiese)、杜尔干 (Durkhiem)、吉丁斯 (Giddings) 和其他一些西方社会思想家的学说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企图独立于西方的“和魂洋才”（意即日本的灵魂、西洋的外表）的学科。建部遵吾的著作《理论普通社会学》（共四卷，1905 年～1918 年）、盖田保马著的《社会学原理》（1919 年）和《社会学概论》（1922 年）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但这些和以后的社会学著作都只是一些偏重理论探讨、脱离实际的形式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展开调查研究来检验和实证理论的尝试，还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战时体制和军国主义气氛的笼罩下，对社会性质的自由探讨和对社会现象的广泛深入的揭露，是不受鼓励的。这时日本社会学者除对日本的家族和农村进行过一些较为有成果的调查研究外，社会学的应用和社会学理论证实的进展，没有得到重视。所以尽管到大战结束，日本的社会学恢复了自由后，仍然缺乏一种长期被忽视的对社会实证研究的有效方法论。

在这段时期内，俄国爆发了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传到

了日本。同时，日本国内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繁荣和萧条的更迭、劳资纠纷和农民问题的扩大，1930年左右世界性的不景气也波及到日本。这些新情况猛烈地冲击了日本的社会学界，在他们的思想上出现了波动和混乱，并引起了彼此间理论上的对抗。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在日本也产生了影响。清水几太郎的《社会学批判序说》（1933年）、早濑利雄的《现代社会学批判》等著作的出版，就是思想左倾的反映。一批以户坂润为首的社会学者创建了社会学者研究会，主要通过对德国文化社会学的介绍和批判，企图创立一种适应时代的新的社会学体系。但由于日本侵华事变的爆发，军阀统治体制的强化，这种企图遭受了挫折，没有得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遭到失败，促使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到了50年代，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一方面批判欧美社会学的影响，更重要的，进行了对社会学本身的批判。这就导致了这些人同战后深受美国社会学思想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的对抗。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也出现了派别，彼此之间自认为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相互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在思想交锋的混乱气氛中，还是有人呼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分析，才能处理种种实际问题”，“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应该正确采用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的分析研究”。同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面对着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也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提高。事实上已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坚信，客观需要使两方面的合作有实现的可能。

尽管出现了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美国社会学的影响还是极为明显的，表现在对社会现象调查研究的普遍重视的转变上。因此，不但战前较有基础的家族和农村的调查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在

产业、劳动、都市、阶级结构、青年、妇女、犯罪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上，都进行了一些科学的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这些工作不但给政府、企业在制定政策和开展业务时提供参考，对人民大众了解国情也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早在1924年就已有全国性的日本社会学会的创立。随着战后社会学的被重视，学会的组织和刊物都有了扩展。今天，在全国性的社会学会和社会福利学会之外，地区性的学会也从战前仅有的西日本社会学会，至1950年以后先后成立了关西社会学会、关东社会学会、东北社会学会、北海道社会学会。学会数目的增长标志着社会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吸引力的扩大。至于社会学专业刊物，战前日本社会学会出版过四期《社会学》，1950年后改出了一种理论性讨论的季刊《社会学评论》。为了国际交流，这种刊物在每期后面都附有各篇的外文摘要。另外，京都、大阪、神户等地方的社会学者也出版了一种《社会学刊》。另一种刊物《社会学研究》主要是由东北大学主编的，《社会论丛》是由日本大学出版的。

随着日本于战后医治创伤力图再度进入世界舞台的形势，1950年日本社会学会加入了国际社会学会，导致了1965年的世界第九届家族讨论会和1973年的亚洲地区社会学会议都在日本召开，引起了国际社会学界的广泛注意。

近半个世纪，尤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政治、经济、社会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科学各个部门原先各自规定的研究界限和范围已与新的现实不完全适应，必须有新的调整，划定新的范畴。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科学都有一些边缘领域。邻近学科、相关学科之间的一些边缘领域所研究探讨的对象，往往相接近，常有相同之处，甚至有一定的有机联系，不可能把它们一刀分割开来。这些领域同原来所属的学科一方面有共同性或有隶属关系，另一方

面却有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但正是由于这种边缘属性，其内容往往易被忽视，往往成为两不管、三不理的境域。为了促进对这些交叉领域的深入探讨，有必要另立旗帜，创建新的学科，从原属的学科独立出来。就社会学来说，早已有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教育社会学、社会病态学、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等等学科从母体中脱胎了出来，从而各自得到了新的发展。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这种分化必然会不断出现。最近由东京大学教授福武直主编的、包括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学讲座》（共十八卷）的出版，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预示着还会有一些新的学科将从传统的社会学中派生出来。十八卷的标题如下：理论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家族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建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社会意识论、现代社会论、社会开发论、社会福祉论、社会病理学、数理社会学和历史与课题等。

以上介绍，多属一鳞半爪，很不系统，仅供参考。

[该文系吴泽霖教授（1898年～1990年）1979年随团访问日本后写的观感。]

吴泽霖“文革”时期在故乡常熟琐记

祝仲煜

1966年初秋，常熟“四清”运动接近尾声之时，在居民小组的学习会上，我听说城西分社里有一对从北京遣送回乡的老“右派”。当时，这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洪流中，区区“右派”遣返回乡实在不足为奇。

事隔不久，在例行的学习会上，一对年逾花甲的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男的稍显老些，但精神甚为安详；女的年轻些，因受北京红卫兵的“洗礼”，头发被强迫剃了，故只能戴顶帽子。这对陌生老人的到来，引起了我的关注。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吴泽霖教授和马时芳夫妇俩。

他俩均在会前站着作了自我介绍。出于对年长者尊重的惯例，我们有些于心不忍，让他俩坐着说就行了，但他俩还是坚持站着讲。介绍是简短的，可从这简短的自我介绍中，我能觉察到他不是一般的“右派”分子，是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丰富的人生经历的。我当时心里很难想通：像这样慈祥和蔼的老人怎么会有什么深重的罪孽呢？

在常熟，他俩与我家同住在和平街，该街是常熟的闹市中心区，我们两家相隔仅一百五十米左右，而且他俩的活动是在我负责的学习小组里，这样我就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开始和他俩有所接触。不接触则罢，接触一多，我就情不自禁地每每于傍晚时分抱着小儿到他们家去聊天。在彼此的谈话中，我渐渐开拓了自己的

视野，增长了许多知识。

他俩对自己的过去经历讲得不多，但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我感到他俩为人厚道，十分真诚和坦率，知识也十分渊博。光是这些，就足以使我这个当过几年兵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后辈得益匪浅了。此后，凡是生活上我家多余的东西，只要他们用得着，我就不时拿去给他们用，尽量减少他们的开支。有时我家有点好吃而又少见的土特食品，我也要拿点去让他们尝尝。在学问、知识方面，我不时向他们请教，而生活琐事乃至炊煮浆洗等事，我则俨然如行家里手般地一一介绍给他俩。当时全国“革命”的“红色巨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什么样的大“走资派”都有被揪出来的，他俩身居常熟小城，平时深居简出，生活虽然清苦，倒也过得平安无事。我从旁观察，他俩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两人的神情也较初来时愉悦了一些，脸色也渐有些红润起来。不久，他们也让子女把卧床不起的老岳母送来常熟与他们一起生活。而我们家与他们家之间的来往已十分亲密，几乎就像一家人一样了。生活中碰到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都会来和我商量着办。

谁知好景不长，“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后，常熟的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再加上当时常熟出了个所谓的“特大反革命事件”，我们之间的接触几乎到了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境地。什么誓师会、声讨会接二连三地召开，不少耳目都已知晓我们家和他们家的亲密关系，万不得已时我们只能相约在医院门诊部的挂号处会面。1969年1月的某天，在百货公司的拐角处，我遇见了马时芳伯母。她神情紧张，手中拿着报纸书籍等物，说是吴老已被关押进了“工纠”，她是去送东西的。我只简短地问了一句：吴老的政治历史是否已彻底全部交待清楚？如果是，则不必担心！此后我们便无法用任何方式联系了。有一次开大会，散会时我尽量靠近马时芳老人家，但边上有人跟着，我们一句话都没法说。这种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感觉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

不久，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事情发生了。一天晚饭后，天已擦黑儿。我带着小儿在百货公司附近闲走，只见火葬场的一辆接尸车从西门开来拐过百货公司朝和平街南端驶去。在靠近人行道边时，车上的工作人员用手电筒查找门牌号，最后，在吴老家门前停住。我的脑子里当即“轰”的一下，下意识地觉察到发生了严重的事情。记得当天下午，我母亲在另一学习小组回来时（该小组活动室就设在吴老家的楼下），我曾问及马时芳伯母是否出席了下午的活动，我母亲说未看见。我当时就有一种要出事的预感。该天午夜，我妻下班回家后将马时芳伯母吞药自尽的情况一讲，我们夫妇俩心情沉重，彻夜未眠。外界消息封锁得很严，打听不到什么结果，仅听到一些零星之言：老太太在医院里抢救。直到吴老的小儿子（吴旦衡）来常熟处理善后事宜（大约在3月份），临走前乘夜黑来讲述事情的经过，我们才较详细地了解到马伯母是因悲观绝望才自尽的，其母周老太太则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而去世的。而此时吴老还被关在“工纠”里审查，对其家庭的变故一无所知。闻此悲声，我们只能长吁短叹，人间世道非要绝人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不可吗？

通过与旦衡的交谈，我更详细地了解到吴老的过去与为人，越发增添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敬仰和爱戴之心。旦衡走后的第二天，我也进了被审查的“学习班”。

吴老在刚进“工纠”时的生活待遇是不言而喻的，每餐只有萝卜干或一小碟蔬菜，以后为照顾他年老体弱才加了一碟小荤菜。生活上的艰难，吴老倒不在乎，最让他头疼的是写不完的自我交待和替外调人员写旁证材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地写出来，还不时遭受呵斥。诸如什么“不老实”、“不彻底交待罪行”、“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等等。面对这样的处境，一般常人是难以忍受的，但吴老在一度的焦虑和烦躁之后，显得极度平静。读《毛选》、看报纸与写材料之后，在难得的空闲

时，还惦念着家人和我家的安全。

大概在他进“工纠”后的第二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全家在后门口小巷里乘凉，一个农村青年向我走来，请求给他2两粮票以购食品充饥。我说年纪轻轻为啥要讨粮票呢？他不好意思地说，因在戏院里闹事被捉进“工纠”，现在刚被放出，实因饥肠难熬而出于无奈。听到他是从“工纠”获释的，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叫他进院详细说说情况，并愿意多给他一点粮票。从他嘴里，我了解到吴老虽身陷囹圄，但身体还尽人意。尽管血压稍高，痔疮时犯，其他尚可。他每天的任务是交替使用着两副眼镜不停地写材料，接待外调人员的讯问和写旁证。这类工作又不能有半点差池，否则会损害他人的政治生命。难哉，老教授！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老人家还要为“工纠”里关押的各色人员（有正面的老干部，也有各类反面人物）组织读报学习。与此同时，他自己还被要求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从中改造世界观。在“工纠”的几年里，吴老读书和笔耕始终未停止过。为了节省纸张，他所书写的材料、学习心得、自我检讨，文字都是细小工整的，有谁能知晓他是交替使用着两副眼镜，伏在简陋的桌子上就着暗淡的灯光，撑着衰老之躯以心血所书写出来的呢！

不久，又有一个修拉链的师傅（与我住同一条街）带着惊喜的心情告诉我：今天看到老教授在他对门的水果店里买水果，但边上有人“陪着”。“陪着”也罢，只要稍有松动，且身体仍较硬朗，总归是好事一桩。我即时将这喜讯去信武汉告知了旦衡。

可能是在1971年的六七月间，旦衡得到常熟城西办事处的信函，称吴老将获释，叫他来常熟，要他做好吴老的思想工作。当旦衡来常熟会见父亲之后，吴老才了解自从自己进“工纠”之后，他家中所遭受的巨大变故。相依为命的爱妻不在了，年近多病的岳母也不在了，自己所面对的是零乱而冷清的陋室，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久，吴老托旦衡转给我一封信，内容如下：

仲煜：

这两年多来，世界在变，中国在变，我家更遭受了大变，你家也没有例外。

这是时代所决定了的，我们无力可以左右。以后还要变，思想上要永远有所准备，否则就要被动，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我一直在牵挂着你，我估计你老兄一家，一定是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随时打听你的一家和伯母的情况。通过“工纠”成员糖业公司的夏咸东，我知道你同他在一起学习，呆过一个时期。据他说，你早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又通过另外几个人，我得知冬年也在某厂当工人。在什么厂，他们说不清楚。同时，从没有人来向我了解你的情况，而对夏和周（我的南邻）倒有人来问过。我推测对你的审查大概已过去了。旦衡已把情况告诉了我，隔些日子，我们当面详谈。我衷心地感谢你对我全家的关怀。路远知马力，日久知人心。我也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表达对你的感激。只有心心相印，由时间来考验吧！

话多无从说起，留作当面谈吧。

霖

7月22日

大难大悲之后，尚能如此达观，出乎我的意料。读完来信，不禁十二万分地欣慰。

此后，吴老就孤身一人住在我家北段的和平街上，虽相隔也是百十来米，但能相见而不能相语。好看电影时也从电影中学到一点搞“地下工作”接头的小经验——我的大儿子上学路过他的

窗口时，只要轻轻一敲，窗子一打开，一张小纸条便递入窗内。吴老在傍晚便准时来我家吃晚饭，饭桌上总有一道他最喜欢吃的“大烧豆腐”。这是我一家四口每月的豆腐券舍不得吃，特意留着给他老人家的。我们边吃边谈，其乐融融。饭后，我先出门“望风”，再让他老人家转个小弯回家。1971年林彪事件后，上面传达了林彪集团的“‘571’工程纪要”和林彪父子叛逃事件，我使劲记着，回来后把精神逐点细细地告诉了他。

此间，吴老的生活十分有规律，看报、读书、写东西是他一直不变的老规矩，但生活上仍十分简单节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他一直都能随遇而安。而好事不分大小，能做的他都去做。如能入中药的东西，他捡到后晒干送给中药铺，故药店的坐堂医生也与他老人家结成了知己；请人倒马桶时，他主动把马桶拎到集中处。他的平易近人使谁也不会意识到他竟然是位学贯中西、在大学里鼎鼎有名的老教授。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运动的自然冷却，常熟城西办事处为照顾他年迈体弱，单独生活有诸多不便，便允许他离开常熟去外地子女处一同生活。他老人家离开生他养他亦使他家破人亡的故乡时的心情，我不得而知，也不敢私自揣度，但我还是深深地为他老人家祝福。他走后，我们俩每隔两月总有一次信件来往，并由我处寄出全国粮票49斤，直到北京有证明来常熟并将他老人家的户口迁出后为止。此后，我们的书信往来始终未曾间断，在他老人家去世当年的3月7日，他的病体稍有恢复时还给我来信，并关心常熟的地震和发展情况。

二十五年的悠悠岁月，似乎只是眨眼的一瞬间，但能品评出一个人做人的胸襟和人格。吴老将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和毕生的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事实上，历史也作出了公正的判断：几年前常熟名人馆中有了他老人家的生平简介和有关照片。虽说这已是在他故世以后才

建立起来的，但这是家乡人民对他的最好纪念，也是最可告慰吴老于九泉之下的缅怀。

回忆有时是甜蜜的，但更多的是苦涩。我就是在这苦涩的追忆中，写出了如上的一段“文革”岁月琐记。劫难之情，弥足珍贵，愿吴老安息！

1998年3月

[祝仲煜，男，1934年生，1949年6月参加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翌年进三野通信学校，1951年6月随志愿军入朝鲜任无线电报务员，后转业至山东。1959年因病回老家江苏常熟休养，现已退休。]